◎文学聚焦

作家研究中心：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深化

宋　庄

今年6月，“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扬州大学揭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研究中心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推动毕飞宇创作的持续与深入研究，也将促进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很多大学设立作家研究中心，如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余华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贾平凹研究中心”、 商洛学院“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潍坊学院“莫言研究中心”、曲阜师范大学“莫言与齐鲁作家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新乡学院“刘震云研究中心”等。众多的作家研究中心成立，对于作家和高校来说有相得益彰的促进。如何看待作家研究中心的成立并探析利弊，将有助于文学的推动与繁荣。

◁王蒙　▽阿来

毕飞宇

贾平凹

推进对作家作品的认识理解

据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温奉桥介绍，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创建于2002年4月，是全国比较早成立的当代作家专门性研究机构。学校对王蒙文学研究所的定位是，把王蒙文学研究所建设成国内外王蒙研究的资料中心、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成为该校文科发展及国内文学研究的一个品牌，以期起到必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王蒙研究已成为中国海洋大学人文学科的一个显著特色，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自2002年以来，该研究所已先后举办9次王蒙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包括“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广泛影响。2004年创办的《王蒙研究》刊物，是全国第一份以当代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刊物，在王蒙研究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时，研究所以《王蒙研究通讯》与“王蒙研究网站”为载体，建设王蒙研究“信息中心”；创办“王蒙研究网站”和《王蒙研究通讯》，向外界介绍、展示王蒙研究成果，也为下一步建设“网上王蒙文学馆”奠定了基础。王蒙文学研究所资料室收藏王蒙各种中文版本著作、研究著作100多种，外文著作、研究著作20多种；王蒙作品展示和王蒙文学活动展室，收藏王蒙手稿、图片、音像资料、获奖证书、实物等近千件。

西北大学的贾平凹研究中心创办于2015年11月，目的有两个：一是探索大学中文教育与作家培养的关系，尝试中文学科学生培养的新模式。二是以贾平凹为个案，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资源；三是以贾平凹及其作品为媒介，打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通道。贾平凹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军介绍说，中心成立后聘请了李敬泽、吴义勤、白烨等一批在当代文学界享有盛名的作家、学者担任客座教授，推进中心文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围绕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召开了4场学术会议，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开展了中心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工作。贾平凹创作中心的成立，建立了大学中文教育作家培养的有效模式，夯实了西北大学“作家摇篮”的品牌地位，梳理了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效的精神与理论资源，同时以贾平凹现实主义文学创造为中心，厘清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风格谱系，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段建军认为，成立作家研究中心，是全球文学研究的惯例，这对于推进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理解与作家的培养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快速发展中，这样的中心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中国文学整体上要走向世界，就应重视这一方面的建设。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曾任余华研究中心主任。据他回忆，2007年创办余华研究中心，一是建立有关余华研究的资料体系。包括余华研究中心网站、中外有关余华研究的所有纸质资料及视频资料的数据化处理。二是围绕余华研究的发展现状，以国际或国内高端会议的方式，开展系列性的文学问题研讨。中心成立之后，建立了余华研究中心网络，对有关余华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和数据化处理。分别召开了三次有关文学本源问题的大型研讨会。

阿来研究中心主任陈思广同时是《阿来研究》的主编。据陈思广介绍，阿来研究中心成立后， 邀请全国各地知名学者举办了两次阿来及其藏区文学研究研讨会，促进了学界对藏区文学的研究，并已出版六期《阿来研究》。“《阿来研究》成为研究阿来和藏区文学及四川文学的阵地，通过发表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专辑，激励作家创作，带动了藏区文学的繁荣。”陈思广说。

西安工业大学的陈忠实研究中心成立有10年之久，也曾召开过若干次陈忠实创作专题研讨会。《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充分肯定了作家研究中心的作用，认为可以形成高校和文学现场的良好互动，开辟文学教育的新方式，同时能够刺激文学的生长，扩大文学的影响，构建良好的人文氛围，也是文学传播的感性管道，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起步。“但应防止功利化做法，不能成立之日就是结束之时，一定要给予宽阔性理解。”李国平说。

加强对体制与机制的支持

段建军认为作家创作中心发展中观念的认识亟需提升，“目前中国大学，还未对成立作家研究中心的积极意义形成普遍共识，因而在体制与机制的支持上，还有待加强。社会对作家研究中心与作家成长的积极关系认识还不够，需要我们拿出更多成功的案例，改变人们的惯性思维。”

洪治纲认为，成立作家研究中心无论是对于作家创作与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整理，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中外文资料的整理，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事实上，现在的学界已普遍重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整理与发掘。

但同时，洪治纲也发现，这些研究中心普遍存在着两个难题：一是缺少专业能力强的专职人员，因为资料搜集与整理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需要图书馆专业、数字处理技术等相关知识，同时也需要多人分工协作。如果从长远角度来考虑，还需要搜集和保管作家的相关实物资料。从目前来看，受经费和人员编制的影响，各个作家研究中心都很难做好这块工作。但这块工作做不好，作家研究中心的作用和意义并不大。二是缺少梯队合理的研究团队。目前的作家研究中心,其代表性的研究人员只有几位,研究团队的年龄结构、研究计划、国际学术交流等,都不甚明了,只是一种短暂的宣传行为,是借助作家的社会声誉,对学校进行一些宣传。

作家研究中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作家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

“没用”与“有用”

——关于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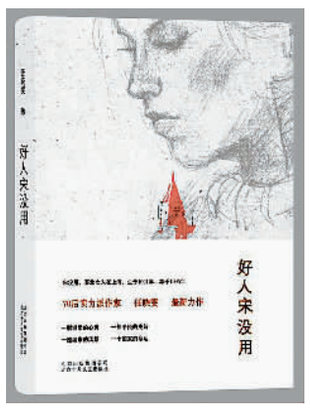
韩　起

《好人宋没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作家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幺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没用”，可就是这样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

作家盛可以认为，任晓雯特别关注民生民情，这是非常难得的。她没有把自己本身的优越感带到文字里。她的与众不同，再加上她的学院滋养，使得她的思想有深度、有力量。简短的句子、有古典意韵的词句，在笔记体小说或者小品文里，驾驭起来没有那么难，但任晓雯却用这样的语言写了一本38万字的长篇，到最终都依然保持创作伊始的耐心。她这样的选择就像踩钢丝，有很高的技巧，同时也很危险，如果没有踩好可能会掉下来。选择和塑造宋没用这个人物，是一种冒险。在那样一个时代，女人“没用”是一种常态和普遍的东西。宋没用纵观其一生，其实是相当压抑和平淡的，甚至是麻木的，但是我们记住了，这就是任晓雯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

在作家石一枫看来，一个出色的“中国故事”应该是“国家故事”和“个人故事”的自然结合。小情绪和大时代并不是割裂的，个人与国家也不是脱节的。一滴水一定来自于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腾为云，最先落下的仍旧是一滴水。《好人宋没用》的写作，展现的是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她就是弱水三千蒸腾为云，最先落下的那一滴水。

很多人印象中的十里洋场的上海，商业繁华，曾经是远东第一城市。但在当时苏北的棚户区，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上海的面貌。任晓雯想写的是在上海的黄金三十年代，被遮蔽在一种非常光鲜的城市下的小人物的生平。《好人宋没用》写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生，本质上是探讨死亡问题。宋没用的妈妈、婆婆、东家和女儿，这4个人是书里隐藏的一条线索，非常典型的4种中国人对待死亡和信仰问题的光谱。宋没用把她们这4种对待死亡、生活、信仰的态度串了起来。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谨以书中我所极力塑造的宋没用形象向世间如宋没用这般的卑微生灵致敬。”任晓雯说。



◎新作评介

一篇硬汉风格的小说

——关于陈九的《老史与海》

梁　彬

应该说,陈九的中篇小说《老史与海》“很男人”,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更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意大利裔的纽约长岛渔民老史(史蒂文)很男人、很另类的性格令人过目不忘。

《老史与海》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美国，中国留学生王彼得为谋生计，给老史打工，开始了一段和老史一起在凌晨出海捕捉龙虾的经历。彼得和老史由陌生到熟悉，逐渐发现老史的经历竟然如此复杂而又充满传奇：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做过中国人的俘虏，由于嗜酒，他还与麦克阿瑟将军交换过酒壶。战后，受母亲的影响，老史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但是，由于老一代人留下的海域无人继承，老史不得不中途退学，成了纽约长岛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渔民。当一个满嘴粗话、喷着酒气的渔民老史，大段大段地吟咏着雪莱的优美诗歌时,我们不难想象他带给人怎样的震惊。老史就是这样,似乎每一个举动总会给人以惊奇。他对雪莱这位伟大诗人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展示了这个粗犷阳刚的男人内心柔软的另一面,令王彼得这个研究雪莱诗歌的博士也惊讶不已。

作者陈九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老史与海》里,他带领我们和王彼得一起走进老史的世界,融入他的世界。而这个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也被作者叙述得波波折折、趣味盎然。由于文化的差异,同在一条船上的两个男人，从开始不时有龃龉和误解，到后来相互依靠，相互激赏。他们伴随着狂野的波涛，在甲板上纵酒豪迈、海阔天空的情景，尽情地展示着生命的豪放与张扬。

老史深谙海的性格，他对龙虾的习性了如指掌，可以说大海嵌入了他的生命里。也正因为如此，养成了他放荡不羁、义无反顾的性格。麦克阿瑟的酒壶，在别人看起来弥足珍贵，对老史来讲，它掉进海里，掉了也就是掉了而已。对病魔缠身的老史来说，他宁愿选择把自己献给大海，也绝不愿做一条搁浅在岸上苟延残喘的鱼。与被动地等待死亡不同，老史选择了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在甲板上，他与彼得两个男人之间的赤诚坦白，相互欣赏与友爱达到顶点。然后他纵身一跃，永远消失在大海中，只留下最后一句话：“彼得，不要找我”。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逃避疾病痛苦的脆弱，而是一个男人决绝的豪迈。老史的纵身一跃，带给我们的也就不止是惊奇，而是深深的震撼。

《老史与海》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那个老人与大海、与鲨鱼搏斗的故事。其实两者之间是那么不同。小说中的老史绝少有与海的对抗，而是把生命融进大海，成为海的一部分。在老史身上，我们看到海一样的澄澈庄严、苍凉与豪迈。

在《老史与海》中，作家对大海的描写从不吝惜笔墨。在陈九的笔下，清纯的、妖冶的、深邃的、狂暴的海，出现在清晨、黄昏、暗夜。小说中，每一次对大海的呈现总是迥然不同，仿佛陈九的心中，大海有着永远不能穷尽的千姿百态。

陈九是一位旅居纽约的华文作家，他的作品在叙述上刚健有力、从容不迫，显示了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小说中，处处弥漫着雄健的阳刚之美，不时激越着读者的内心。作家把着力点用在打造一个血肉丰满的好看故事上。虽然他沿用的是平淡无奇的写实主义路子，在叙述上也不见什么刻意的策略，但他总是有能力把小说写得风生水起，把情节打造得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小说的篇幅并不长，但却写得扎扎实实、丰盈饱满。相比于那些文字冗长却内容空洞的作品，陈九的写作更体现着对读者的一种负责。

◎作家谈

万卷山移　一篇吟成

——阅读李敬泽随感

徐小斌

清理书柜，偶尔翻阅18年前李敬泽赠我的《枕草子》。清少纳言的美丽文字，浮士绘式的封面，已经发黄的内页，似乎叙说着一个时代的逝去——而之后这个时代，这个叫做李敬泽的人，乘一片东西方雨滴融为一体的云朵，冉冉升起。

世间才华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一种是博。若论前者,庄子曾引孔子之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于是,池水渐黑方有张芝,蕉叶成塚方有智永,“语不惊人死不休,”方才有了杜子美。年深日久,腹有诗书,方才有了李敬泽。

然而，仅仅如此，又不成其为李敬泽。李敬泽的厉害，在于他不仅专而且博：他大约早已深谙放翁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与写文章有何关系？而司马迁却因此“奇文疏荡、颇有奇气”；舞剑与书法有何关系？而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这两件事，说的就是只有“专”到一定程度，才能谈得到博，所谓博大精深4个字的境界，并非那么容易达到，谁都知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又有几人得知“万卷山移、一篇吟成”的道理?!

早在上世纪年代，李敬泽的书柜里便堆满了奇珍异宝。从《陶庵梦忆》《玄中记》到《宋元笔记》《石屋续渖》……真正是个包罗万象的世界。书屋主人“守着一盏孤灯，静静地摩挲着文字和词语，世界隐伏在无边的黑暗之中，他精心地痛苦地雕琢着自己的感觉和体验，像一个沦落的贵族，醉心于昂贵精美的无用之物；又像一位痴迷的工匠，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出这个世界上不曾存在之物。”这位痴迷的工匠在静夜中造就了一个东西方文化贯通的世界：不仅有俄罗斯的厚重、法兰西的轻灵、英吉利的雍容、德意志的严谨，更有“汉魏雄浑”“唐人婉壮”；无论是文学的“公安”“竟陵”“桐城”抑或是绘画的“吴门”“云间”“新安”，都逃不脱他精细双眸的追踪、入眼、入心、然后入魂，建立了他自己的风格——无法被任何人复制与淹没的风格——“风格即人”。

李敬泽在《一世界的热闹，一个人的梦》中写道：“张岱和他的人群见证了‘末世’。他们见证无限的美、无限的繁华、无限的精致复杂，见证了缓缓降临的浩大的宿命。休说是王朝鼎革、人事浮沉，这种宿命的末世感将穿越康乾盛世，结出一朵最美的花，所谓‘阆苑奇葩’：《红楼梦》。《红楼梦》是无数梦的影子，其中有张岱的梦。”然，“张岱真正喜欢的事是：文字。 ”

读至此处，你自然意会张岱便是作者对自身的指射——入世与出世的自由转换，从阆苑奇葩到末世绝响，内心却只认准了一件事：菩提无相。

正当你自以为读懂了他的时候,《风中之信》与《无神之颂》,却又进入了另一个不相干的维度,是二次元吗？不是。

“……他的父亲弓如满月，二十五年，一根弦从未松懈。但是，谁能想到呢？父亲最终还是犯下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怠慢了晋公子重耳。”

“史书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就是这羞于出口的‘不礼’最是可怕，它深不可测，埋伏着无法度量的仇恨。……这一生战战兢兢、辛辛苦苦，原来经不住一次‘不礼，天下之大，最得罪不起的竟是陌路之人。”

——太经典了！“不礼”，对于一条尚困于沙滩的蛟龙来说，无异于杀戮，因为“不礼”便是杀了内心高贵的人的精神。看到此处，忍不住击节赞叹！最得罪不起的竟是陌路之人，换在今天，就是“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这种事情其实狠狠地教训了那些势力小人，那些自以为是、得意忘形的人，然而，于卫文公却是冤枉，无意中的一次疏漏，竟造成了亡国之灾！历史是无数偶然性的组合，然而那些偶然中却隐藏了必然。

你又以为读懂了他，但是，还是请作者自己谈谈他的文字吧：“人和人、文化和文化、文明和文明之间也这样，过程中充满了误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穿过重重误解达到理解。”

“我们需要更宽阔的视野。现在动不动就是东方中心或者西方中心，这是一种二元对立，并不符合实际。考古发现，人类有文明以来，不同文明间一直在相互交流和影响。面对历史时，要有个庄重的基本态度。逻辑不能相互矛盾。我们这个文明直到明代都是成功的，清代在一定意义上也大获成功，也就是说在五千年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是领先于世界的。”

“今日说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中亚草原历史和内亚历史，都无法绕过斯文·赫定和伯希和乃至斯坦因这些人。他们干了一些掠夺文物的事情，但也确实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发现和认识。”

“我当初阅读写作就是因为喜欢，但没想到，本来是在小巷里走路，一不小心走到了大街上。我喜欢的草原史、内亚史、器物史、中西交流、语际书写和笔记小说，这些在90年代末都是偏僻的趣味，现在却变成了在学术和阅读中相当热的话题。”

……

如此这般，我们大概明白了，文本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标志着作者内心的丰富程度，正因如此，苏轼有他的“大江东去”，亦有他的“寂寞园林”；辛弃疾有他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亦有他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于是，李敬泽有他的“菩提无相”，亦有他的“怒目金刚”与“无量净好”。

故世间杰作，可以是“天魔献舞、花雨弥空”（袁枚）；亦可是“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诚如马克思所云：“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于是这朵祥云飘落尘世,令万卷山移,一篇吟成。